



你要了解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国的神话传说吗？  
你要读懂相邻民族的文化发展与交流的轨迹吗？  
你想摸清那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吗？  
那你就不要绕开那里的汉文典籍，  
读一读那些用汉字撰写的文学——汉文学吧。

王晓平/著

# 亚洲 汉文学



文化新经典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亚 洲 汉 文 学

王晓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汉文学 / 王晓平著. —2 版.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201 - 03840 - 7

I. 亚… II. 王… III. 汉语—文学史—研究—亚洲  
IV. I3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942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6 月第 2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495 千字 印数: 1 ~ 3,000

定 价: 49.00 元

# 汉文学是亚洲文化互读的文本

## (修订版自序)

在古代亚洲地区,不仅汉民族用汉字来书写,有些汉民族以外的民族,也曾经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还用汉字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用汉字作载体的文学,都称为汉文学。

域外汉文学虽是中国文学的亲戚,却是生在各方,不相往来,姓着各自的姓,过着各家的日子。因而,今天也就在各国文学史中加以研究。韩国文学史里描述和探讨的是古代朝鲜半岛的汉文学,日本文学史里探讨的是古代日本列岛的汉文学,这些都自不待言,而古代与中国有册封关系的琉球王国时代的汉文学,也在日本文学史里探讨。对于越南人来说,古代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区的汉文学都属于域外汉文学,而对于中国来说,域外汉文学则是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汉文学。所以,如果同样使用“域外汉文学”的概念,实际上却是各有所指。不管这些文学在内容上有多么不同,在全部用汉字书写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当需要把它们一并纳入研究视野,并且展开国际合作研究的时候,人们就希望找到一个公认的表述方式。迄今已有东方汉文学、东亚汉文学等说法,我这里采用的是亚洲汉文学。说法不同,所指大体相同。

我们拈出这样一个概念,还在于古老的汉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被遮蔽或淡忘的历史符号。18世纪后半期以来,亚洲各国经历的亘古未有的文化转型,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历史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一度不同程度地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精髓认知不足的偏差。亚洲汉文学在各国文学史上的作用,是无可比拟与无以替代的。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化,是有赖汉字记录下来。那些汉字的写本和印本中,有各民族的沉浮盛衰,也有各民族的喜怒哀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你要了解邻国的神话传说吗?你要读懂相邻民族的文化发展轨迹吗?你要摸清那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吗?那你就不要绕开那里的汉文典籍,不要绕开汉文学。

在今天涉及国家间的一切活动中,文化的介入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理解我们周边的历史文化,也显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紧迫。不仅处理相互之间的问题,需要彼此了解,就是处理和亚洲外部的关系时,相互的理解也会带来巨大方便。告别对周边文化的冷漠,伏下身来彼此读懂各方文化,进行“文化互读”,是展开对话必要的心理准备和技术准备。这里所说的“文化互读”,就是文学经典的相互理解,就是通过文学经典谋求的沟通。亚洲汉文学就是亚洲文化互读的基本文本之一。

《亚洲汉文学》是一部旧著。由于时间紧迫,这次修订,主要是全面核对引文,订正排版中的错误,而在内容上一般没有作修改。然而,现在看来,这一领域研究的意义比初版时更为突出。在亚洲汉文学通史还没有问世之前,它还可以揭开那被学术主流来不及顾及的一隅,把我们带到一个斑斓奇崛的文学世界,让我们诵读到一些似曾相识而不曾谋面的汉诗、汉词、汉随笔、汉小说,较近距离地接触古代东亚文化。书中虽然没有使用“互文性”这个术语,但实际上着重探讨了这些作品与中国文学的互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 汉文学是亚洲学人同读共赏的文学遗产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就已经陆续出现一些零星的域外汉文学的研究论文,台湾的研究者还将冈田正之的《日本汉文学史》等书译成汉语。提倡对汉文学进行整体研究,也不是笔者的发明。台湾学者和海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特别是《越南汉文小说丛刊》、《韩国汉文小说全集》、《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文献的整理出版,为我们汉文学研究敞开了大门。

笔者所想做的,仅是首先搞清楚各国汉文学发展的历史真相,而后将中国以外的汉文学和中国本土的汉文学联系起来,进而与各自的民族文字书写的文学联系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某一国的汉文学和其他国家的汉文学也联系起来,探讨汉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这样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亚洲汉文学的影响不仅在于它拥有汗牛充栋的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将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的悲欢离合传于后世,而且在于其以大体相近的文体、文学观念和文学语言形成了一个覆盖广大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具有地域性的国际性质的文学体系。

这个体系的文学概念,远远大于今天西方文学体系的文学概念,古代的文学即文章之学,不仅是供读者阅读欣赏的文艺性作品,而且具有广泛得多的现实功能。如果说这些作者具有与今天所说的作家相近的身份的话,他们同时还具有的诸如帝王、官僚、僧侣、闺秀等社会身份,也为他们的创作打上深刻的烙印。他们以文为政,以文为教,以文为礼,也以文为戏。由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形式多样的诗文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而以志怪、传奇、历史演义为主要品种的小说虽然发展较晚,却也由于汲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而具有鲜明的特色。汉文学主要依赖书面传播而不是口头传播,汉文戏剧实属罕见。然而,甚至在民族戏剧的领域,汉文学提供的故事与典故也积极影响到它的题材乃至审美趣味。至于在完成本民族语言的诗歌、散文、小说方面,在形成各国对文学的共有认识方面,汉文学的历史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一般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而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却认为,汉字是兼有“表意”和“表音”的“表语”(logogram)文字,因而能够超越时间(历史)、空间(地域)所造成的发音差异和变化,宜于将其意义正确传达下去。汉诗生命力旺盛的原因,首先就应该从“语言——文字——诗型”来加以考虑。他还认为,日本人喜欢训读汉诗,还在于它作为“文语自由诗”(“非定型诗”)恰好与和歌、俳谐等日本“定型诗”相辅相成,构成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定型诗”与“非定型诗”并行不悖的格局。正因为汉字、汉语的特点,使得今天的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不仅可以读懂秦汉以前的

典籍,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读懂千年以前的域外汉文学文献。同样,具有较高汉文水准的越南学者,在阅读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汉文学方面,也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这给我们相互理解对方或多方古代文化带来极大的便利,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阅读的难易并不仅在于文字,还在于文字背后言传不尽的文化内容。汉文学的繁荣,主要是出自各民族发展文化的需要,而不是汉民族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侵略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是出于各民族自身的选择和蕴蓄(connotation),是各民族作家才华和创造性的结晶。它不适用于今天使用的“殖民文学”、“后殖民文学”的概念。汉文学的兴盛,并不是汉民族对周边民族既有的书面文学强力扼杀、灭绝土著文字、强行推动汉语写作等措施的产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文学反映了各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是社会公认的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是各个时期文化担当者所必须掌握并首先使用的文学样式,是社会通行观念和作者个性的通用载体。在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古代,有不以汉文学为主要写作体裁的作家,但却没有毫无汉文学修养而雄踞文坛的作家。从与周边文学的关系来看,汉文学的发展给民族文学发展带来的绝不仅是压力。从各国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来看,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具有共性的,如儒家的“大同”理想和安邦治国的使命感、道家随顺自然的生命观和宇宙想象、佛家的无常观和慈悲观等等,成为汉文学相通的内容,而重诗文的文体价值观、重风格韵味的审美意识、以及多用典、喜美化、讲声律的语言技巧等等,都是可以相互欣赏,并很容易沟通和理解的。公元998年宋人羌世昌到达日本任国,《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的父亲藤原为时在迎宾礼上赋诗,其中有“言语虽殊藻思同,才名其奈昔扬雄”两句,很好地表达了在一种共同的汉文化修养和艺术规范的基础上通过汉诗获得沟通的喜悦和自负。

然而,各国汉文学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们的“同”,更在于它们的“异”。就文体而言,既有基本相同的汉文体,又有面目不同的各自的“变体汉文”和汉文与各民族文字的混合体,文学样式既有共同的古体诗、近体诗、笔记、传奇、志怪、历史演义,甚至笑话,又有中国文体适应本民族文化需要后培育出的体裁。

刘勰《文心雕龙》已经谈到三十五种体裁,即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对各种体裁的特征、写作方法、相互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源流皆有论析。但是,他对佛教和道教文学中使用的特殊文体一般未加涉及,而且在他去世后,还有一些文体获得发展,更为丰富,例如唐代韩愈的“原”、柳宗元的寓言,以及那个时代兴盛起来的各种“记”。随着文学的发展,也有一些文体后来很少有人运用,如《文选》里收入的“七”。

虽然远在秦汉甚至更早,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与地区便与中国开始了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域外汉文学兴起并且形成气候,仍然是在中国唐朝以后,因而从文体来说,较之《文选》与《文心雕龙》时代更为丰富,为适应各国政治文化的需要,对文体还有所选择,或弃置,或扩衍。日本《异制庭训往来》说:“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是作家良匠量其材,制其形也。以上汉朝作文之体也。本朝作文之体者,别有纶旨。院宣、国宣、御牒、朝状、申状、讽诵、愿文等也。”这里提到院宣、国宣、御牒、朝状、

申状、讽诵、愿文都是日本独特的文体,显然并不完全正确,例如愿文在中国六朝和唐代就是相当普遍使用的佛教应用文体,而非日本所独有,只不过在一些中国文学总集中不曾单独列类而已。然而,这里也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各国各个时代有着各不相同的文体在发展。我们不妨分类看一看各种总集中的不同文体。

为政之文,即在政治活动和行政管理中使用的文体。其种类之多,划分之细,是各国汉文学共同的显著特点。较之于中国历代编辑的诗文总集相比,域外汉文学各种总集收录的政治文体更多更杂。除了《文选》中的诏、册、令、教、文(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之外,朝鲜时代的《东文选》还收入了状(一种向上级陈述事情的文章)和露布(不缄封之文书,后专指捷报)。日本平安时代的《本朝文粹》虽然是参照《唐文粹》编撰的,但根据日本汉文的实际情况,分类上有很大变动。一般认为《唐文粹》的分类已很琐碎,相比之下,《本朝文粹》划分更为细致。下面这些文体便是唐宋时代没有或者很少见到的:位记(由天皇发布的记述授予位阶之事的文章)、官符(太政官向所管辖机关下达命令时的文章)、意见封事(臣下对天皇上奏有关政治问题的看法的文章,语出《文心雕龙·奏启》:“自汉置八议,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起请文(保证言论真实无伪的文章)、奉行文(陈述接受天皇命令予以实行的文章)、禁制文(告知禁止某种行为的文章)、落书(以对社会风潮或特定个人进行讽刺批评而撰写的批评文章),等等。继《本朝文粹》之后编撰的《本朝续文粹》,又增加了勘申(在朝廷调查诸事的先例、日期、吉凶等上奏的文章)、都状和定文。

为教之文,即在宗教仪式或者传播活动中使用的文体。在儒家祭祀孔子或者佛教法会、道教斋醮等场合,都有相应的文体。汉文学广泛渗透到宗教活动之中,在各国均无例外。日本平安时代《本朝文粹》收入的咒愿文、发愿文、知识文、回文、愿文、讽诵文,高丽时代的《东文选》收入的道场文等都属于佛教文学,而《东文选》中的青词则是道士斋醮上奏天神的表章。

为礼之文,即在个人或群体交往各种礼仪活动使用的文体。在朝鲜半岛,由于长期汉字是惟一的文字,而又采用音读的方法,因而甚至在宫廷与民间礼仪活动中也广泛采用了汉文文体。《东文选》和《续东文选》都收录了《上梁文》,这是在宫廷修造重大建筑时上房梁前祈愿的文章,大体与《敦煌愿文集》中收录的敦煌地区的《上梁文》相近。

为戏之文,即在以语言文字为娱乐活动的场合使用的文体。利用汉字音义而发展起来的回文、离合诗、物名诗等,具有文字游戏的性质,这在平安时代的诗文别集与总集《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中兼有收录,而江户时代将日语与中国汉字结合而产生的狂诗、狂文,更是两种文化杂交而孕育的娱乐新品种。高丽文人模仿韩愈《毛颖传》,以物拟人,写出了众多诸如《竹夫人传》、《鞠先生传》等的作品,或者以动植物及心性拟人,这种游戏之作是朝鲜半岛汉文小说的滥觞。还有一类是以人的性活动为主题的游戏之作,如日本《本朝文粹》所收《铁锥传》。

以汉文学文体的比较研究为突破口,或许可以纠正拿西方文学观念来对汉文学削足适履造成的某些偏差,显露被西来标尺遮断的汉文化的千姿百态。同时,以上这些问题,哪些应该纳入文学研究领域,仍有重新加以讨论的必要。恰当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拉丁语文

学的研究、写本的研究等经验,对于展开汉文学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汉字文化圈内部的对话的发展,汉字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发展,今后将更加不可分割。

古代东亚各国各地区的文学家,把他们各自的语言汉化之后,写进了汉文学中,也把他们的爱憎好恶,用汉文学来加以表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汉文学代表了那些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官方文学,是文化精英主宰和完成的文学,而不是所谓“第二国文学”。今天国外有些“国文学史”,把汉文学排斥在外,实际上很难说是一种完整、科学的文学史观。日本学者河上肇曾经指出,汉字的魅力,是日本人至今还在作汉诗的原因之一。笔者因而相信,只要汉字存在于社会生活,那么,汉文学就会获得它的知音,鉴赏汉文学的历史便不会中止。

### 汉文学是东亚文化交流的宝贵结晶

日本学者村井章介著《东亚往还》一书,着重指出,从遣唐使、菅原道真时代起,东亚外交上的共通语言就是汉诗文,在以中国人为中心的人员往来中,公私场合都有很多汉诗文的唱和,异国间人们内心交流得以成为可能的前提,就是这些诗歌所具有的超越民族、思想差异的世界性。我们还不应忘记,从9世纪到17世纪,这种以汉诗文为中心的交流,使典籍、书法、绘画、体育、文物等多方面物质的交流活动,有了思想和精神的意义。

汉文学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核心地位,还表现在各民族文学家对本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的渴望和激情上。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本土文化,各国文学家不仅积极寻找将本国文学传向中国的机会,而且努力通过汉译将本国固有的文化介绍给中国。韩国《均如传·第八译歌现德分者》说汉诗与韩国乡土歌谣乡歌“同归义海,各得其所”,各有其美,而两者却不能相互欣赏:“而所恨者,我邦之才子名公,解吟唐吟;彼土之鸿儒硕德,莫解乡谣。矧复唐文如帝网交罗,我邦易读;乡札似梵书连布,彼土难谕。使梁宋珠玑,数托东流之水;秦韩锦绣,希随西传之星。其在局通,亦堪嗟痛,庸詎非鲁文宣欲居于此地,未至鳌头;薛翰林强变于斯文,烦成鼠尾之所致者欤?”因而下决心,要把乡歌中的佛教歌谣译为汉诗,让中国人也能读到。均如热切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汉译乡歌,让中国诗人理解韩国独特的文化,让韩国本土文化走出国门。他很早就在做我们现代人想做的工作了。

日本江户时代也出现了将《源氏物语》、《太平记》、《南总里见八犬传》等改写成汉文小说的尝试。这也是有感于中国小说在日本流布甚广而日本小说却在中国少为人知的现实,积极谋求文学交流的平衡和对等的一种努力。菊池三溪《译准绮语》自序中说:“抑禹域之以小说彰者,亡论《水浒》、《西游》、《金瓶梅》、《演义三国志》,流传我邦,译以解之,脍炙人口,而至于我邦草纸、物语、《源语》、《势语》、《竹取》诸书,命意虽或奇,行文虽或妙,以其文系于国字,令西人读之,爰居钟鼓,弗能领解其意,是以前传于彼者,落落晨星(才?)屈指,况于晚近稗史乎?予有慨于此,抄近古院本小说稗史野乘犹翹翹者,译以汉文,欲令西人食指染鼎吃一脔焉耳。”遗憾的是,当时这些日本小说汉译本很可能都没有能传入中国,即使有人读到,也没有引起注意。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菊池三溪等汉译者的工作。



尽管如此,对于周边国家文学家寻求对等交流的努力,中国一些开明的学者也曾给予积极的回应。清代嘉庆年间学者翁广平(1760—1843)编撰的《吾妻镜补》,在《艺文志》中著录的主要就是日本的汉文典籍,清末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广收日本汉诗,予以简评,又编《东瀛诗纪》介绍日本汉诗人。后来黄遵宪和沈文荧还为石川鸿斋批撰的《本朝轨范》作了联合点评。这些例子,都说明我国学者确有以开放、谦逊、宽容的态度接受域外汉文学的传统。这是汉文学能够在文化交流中曾经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

汉文学在打通各国学人心灵中的历史功绩,在文学交流史上常被人提及,而汉文学在各国吸收西方文化过程中的桥梁作用,还没有深入研究。朝鲜李朝文人柳梦寅(1559—1623)《於于野谈》对欧洲基督教和利马窦的事迹与著作给以介绍评述,注意到欧洲人“重朋友之交”,以及欧洲的“士”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多精天文星象”,说利玛窦“周游八万里,留南粤十余年,能致千金尽弃而入中国,尽观圣贤诸子书”。尤为重要的是,柳梦寅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观舆图洋海诸国,中国在东隅一偏,小如掌,我国大如柳叶,西域为天下之中。”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许多日本人远游印度和欧美,他们多用汉诗和汉文游记来描述他们的异国体验。读他们的作品,就能切实感受到,汉文学修养实际上是他们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

从古至今,尽管有很多作家和学者为亚洲各种文化平等、平衡、对等交流进行过不懈的努力,然而,汉字文化圈内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仍不是轻松的话题。不仅在看似相近的表达方式之下,其中的不同之处反而更容易忽略而形成认识的盲点,而且类似的现象也常常产生认知上盲目的满足感。近三十年来,所谓“中西比较文学”十分盛行,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视角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这不应看作正统的、惟一的把握文化问题的方式,也不应该忘记,这种方式无意识中将中国文化视为与西方文化整体相对峙的一种文化的提法,很容易被误解为漠视周边文化的态度。某些亚洲学者对此表示反感,这提醒我们要以更加严谨而开放的姿态加强对各邻边文化的研究。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把域外汉文学仅仅当成汉文学的支流是不够科学的,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应该给域外汉文学适当的地位。这是因为,不与各国文化结合起来,对它们的研究就容易堕入片面。不懂该民族的语言,对该国文化没有切实的体验和足够的知识,也是很难对这个国家的汉文学有独到的研究。道理很简单,读不懂用民族语言撰写的非汉文学作品,就无法理解汉文学的真实作用;读不懂该国学者对汉文学的研究著述,就不可能发现新的问题;更不用说展开广泛的对话和交流了。最重要的,就是很容易看轻汉字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的差异,使相互之间的心理距离拉得更远。

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很难使古代汉文学在今天的文化交流中发挥最大作用。这些都是显而易见无须赘言的。

### 汉文学是亚洲学人共同的学术资源

60年以前,日本成立了国民审议会,对汉字的去留展开谈论,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说英文只有26个字母,而汉字却有四万几千个字,由于记忆汉字,日本推延了科学发展,这与战败

有很大关系。听到这种议论,京都大学教授铃木虎雄奋笔疾书,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无能短见惑操觚,标榜文明紫乱朱;  
限字暴于始皇暴,制言愚驾厉王愚。  
不知书契垂千载,何止寒暄便匹夫;  
根本不同休妄断,蟹行记号但音符。

铃木虎雄的这首诗,至今还有启发意义,那就是对汉字不仅应看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而且还要在正确评价其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处理好它的现代化问题。汉字简化,很有必要,同时汉字作为一种有别于拼音文字的独特文字体系,完全可以独擅其场,和各类文字各领风骚。与60年前相比,今天已经看不到试图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决策机构在活动了,但是,英语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更为强势,汉字文化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而令铃木虎雄深感义愤的“汉字导致文明落后论”,也很难说永远寿终正寝了。

从19世纪末开始,传统汉文学在各国都踏上了衰微的末路;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形式也被许多人弃之不顾。其间的原因,不是这里可以说清的。汉文学颓败的事实随时提醒我们,要将过去的汉文学变成创造新文学、新学术的资源,还需加倍努力工作。对古代亚洲汉文学加以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理解历史传统、寻求创造新汉文化的元素。

陈庆浩在《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总序》中说,汉文化整体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汉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发展,足以丰富中国汉文化的认识,更具重大意义,只有通过整体研究,才能将他们在汉文化中的位置,对中国汉文化的吸收和发展真相全面显示出来”,林明德《整理、编印韩国汉文小说全集缘由》认为华人研究韩国汉文学,“既可探讨中国文化、文学对韩国之影响,亦可兼做各种比较、研究之工作,复能体认韩国文学之本质,且可窥见昔日友邦汉文大家之才华,及东洋文化之伟大”。这些看法,强调的都是如何让古老的汉文学来丰富今人的知识库、思想库,使我们拥有更大的文化消化力和吸收力。

某些新的学术课题的发展,其前景往往是难以料定的。不过,如果设想一下,亚洲汉文学的研究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到底会带来哪些新鲜的内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时要依赖文献学的新发现,所以下面这些方面,实际上是与此两者相关的。

首先,在邻国汉文学中,保存着中国散佚的文学文献。近年来对亚洲汉文学中保存的与敦煌文学相关的文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字学、历史学等的材料。

来华的使节、留学生、僧侣撰写的汉文、汉文游记、笔记,以别样的眼光,记录了中国历史的细节。其中朝鲜使节撰写的大量《燕行录》已在韩国整理出版,是研究亚洲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同时,在这些记述的基础上,学人们还创作了很多以赴华使节经历为题材的汉文小说。

其次,在邻国汉文学中,保存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域外传播和接受史的丰富材料。在朝鲜汉文小说中,不少作品以中国为舞台,而在日本汉文小说中则不乏根据中国故事“翻案”(即改写为

发生在日本的故事)乃至假托中国人写作的作品,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汉文化在周边地区的传播和影响,而在其中的千变万化,则折射出彼此的文化差异。

再次,在汉文学中,保存了各国民族语言文学的中国元素的来源资料,欲对各国文学原始察终、辨同析异,则舍此不免见木不见林。日本明治时代成书的《谈丛》一书中引用了依田学海的话:“近来国字改良论起焉,国语调查会置焉,逐时趋势之徒,直把汉文为漫为絜,甚则欲废弃之;不知国文虽由字与语,其结构布置,不得不取准汉文。夫《源语》五十四帖,称为国文最妙者,然一条帝评之曰:‘是善语《日本纪》者也。’《日本纪》文非汉文乎?是知不熟汉文,则国文终不能妙也。顾世之学者,往往陷溺所习,是以笔失精神,文竟归死物。”依田学海的看法,很有见地,至于汉文与现代日文的关系,还颇有探讨的余地。各国情况又相距甚远,研究内容和方法都有待于进一步探求。

最后,汉文学本身,就是各国的“国文学”。韩国古典文学名著《东文选》序曰:“是则我东方之文,亦非汉唐之文,乃我国之文,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同样,日本汉文学虽然充满了源于中国文化的用典、戏仿(parody)、拼贴、改写、引用以及其他涉及文化各方面内涵的“前知识”,构成互文性参照,然而也正如王三庆在《日本汉文小说丛刊序》中所说:“如果追根究底,这些汉文学作品纵使以中国文学为肌肤,脉络中流动的却是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和血液,在文化和文学的传承转化当中,曾经以思想前卫,引领一代风骚的姿态,走向未来。”因而,深化汉文学研究,也就可能催生出对该地区文学、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由于很多汉文学作品没有得到印本流传的机会,仅以手稿传留下来,至今整理出版的作品仅占很小的比例。中国、日本、越南、韩国陆续对写本汉籍影印出版,如韩国出版了《笔写本古典小说全集》等,这些影印本与敦煌写本等中国写本一起,构成“汉字写本学”的基本资料。“写本学的宗旨是对体现手稿在其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内在和外在的全部特征进行最理想最详尽的描述”([瑞士]安·克丽丝蒂娜·谢勒一肖布著,王启龙译:《敦煌与塔波古藏文写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法国汉学》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5页)。在将中国写本与海外写本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运用严格的技术分析方法,将写本作为汉字文化圈各个特定历史时期及其背景的见证物来研究,建立“汉字写本学”以追寻汉文文化的哲理蕴含等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好。本书中引用的资料,不少来自写本,对其中的俗字、别字没有特别加以说明,一般改为正字。对汉文学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也是今后很值得期待的。

今天,在中国以外,尽管汉文学已经退回学院,极少有人写汉诗、作汉文,然而由古代汉文学传于后世的民族英雄志士哲人故事和各种情节,已经深入各个民族精神的深层。因而,即使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人,也应当具有一些有关古代汉文学的知识,才能够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在堪称交流与对话时代的21世纪,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观照之下的汉文学研究,已经上路。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我们的周边文学,也期待更多的域外学者,充分利用汉文学的文本,展开文化互读,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汉文学与其他各种文学走向繁荣的课题。

# 亚洲汉文学的文化蕴含

## (代 序)

在古代亚洲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诸民族文学家创作的汉文学作品中,有亚洲文学中的瑰宝,也有世界文化宝库的珍品。亚洲汉文学历经数个世纪的磨砺积累,留下了数不清的佳作。然而,迄今我国出版的各种中外文学史,大多对域外汉文学语焉不详,更谈不上对其整体的科学描述了。这与它悠久的历史及在世界文学中的贡献极不相称。亚洲汉文学概念的提出,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既是为了强调研究的整体性与开放性,也是为了通过对域外汉文学文化内蕴的探讨,寻求有关汉文学兴衰及其与近代亚洲文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答案。<sup>①</sup>

### 亚洲汉文学的历史与现实

日本9世纪初学者斋部广成所撰《古语拾遗》(公元809年成书)说:“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书契以来,不好谈古,浮花竞兴,还嗤旧老。遂使人历世而弥新,事遂代而变故,顾问故实,靡识根源。”这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日本汉文学发轫的轮廓。即古代日本本无文字,汉字传入日本,人们便急切地追求新知,至9世纪初,该书的作者已产生了追根溯源、回顾历史的意愿。这说明当时日本的汉文学已经迈过了幼稚的仿拟阶段。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与印度支那半岛的汉文学也正花开一方,曙光初现。

大约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周边国家便已先后进入汉文学的滥觞期。<sup>②</sup>受佛教兴盛影响,吸引来到中国的各国僧侣,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踏上了接触中国文学的漫长旅程。战乱中大陆文人学士的南迁与东渡,加快了中原典籍与思想文化的传播,定居高句丽、新罗、百济及安南的文人学士,将他们的才智与当地文化的结晶留在了汉文学史的扉页。《宋书·蛮夷传》所载倭王即雄略天皇的表文,文多骈偶,广

引《诗》、《书》，与留存下来的当时其他稚拙的文学资料相比，足可推断存在中国移民文士润饰的可能性。<sup>③</sup>《日本书纪》有显宗天皇元年（公元485年）三月三日举行曲水之宴的记载，如果此说不诬，那么当时的好诗善赋之士便有数十人之多了。

唐代以来，各国派遣来华的留学生、留学僧增多，在长安等地直接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与中国诗人唱酬赠答，晁衡、崔致远及《全唐诗》所载安南举子的诗篇，完全遵循中国诗歌的规范，与当时大陆诗风交融。<sup>④</sup>留学生、留学僧回国时倾囊购回旧典新作，回国后不仅活跃于政治与宗教舞台，而且也成为本国汉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日本的山上忆良、吉备真备以及留下《三教指归》、《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遍照发挥性灵集》等多种诗文、文论与训诂学著述的弘法大师空海，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各国汉文学大抵经过中国移民作家群与留学生留学僧作家群活跃的准备阶段，便由成句拼接到独立谋篇，从步步模拟到自如创作，从模写汉唐风物到描绘民族今昔，迈进本土汉文学阶段，并与中国的文学思潮形成此起彼伏、交相辉映的格局。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域外汉文学大致出现过四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8至11世纪的日本，是汉唐文学的咀嚼期。近江、奈良、平安三朝，佛教大兴，汉学勃兴，学制完备。奈良、平安两朝的贵族汉文学，以宫廷为核心，始被六朝遗风，继而追慕初唐四杰，终于元白崇拜。史有《古事记》、《日本书纪》，诗有《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文有《经国集》、《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英才辈出，奎星映空。同时期朝鲜半岛骈丽文风正盛，古体近体诗多佳构，而越南使用汉语文体也大局初定。从当时世界文学发展来看，汉字文化圈应该称得上是“风景这边独好”。

第二次高潮，以12至15世纪的高丽为代表，是宋元文学的咀嚼期。陶诗韩文，奉为主臬，推举苏黄，称扬梅欧。诗话初兴，文集大备，禅宗文学风靡一时。基本作家队伍从以科举制度为依托形成的文人官僚集团中产生，在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摄取中自然呈现出与前一时期日本贵族不同的倾向。越南李陈两朝，尊佛友道，诗文取士，两朝宗亲多善文礼佛之士，故诗多禅语，文尚丽辞。日本在平安贵族汉文学陷于停滞并历经多年战乱的情况下，汉文学由远离政坛的以五山为中心的禅林一脉单传，其特点是“大陆文化的直接移入，吸收的是宋元文学，咀嚼的是程朱理学”。

第三次高潮，时为15至17世纪，是程朱理学文艺思想的光大期，各国汉文学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朝鲜李朝崇儒抑佛，载道宗经，学奉朱子，诗尊李杜。各国民族意识高扬，民族文字的创制与推行，在汉文学之外再辟新境，而两者的相互影响与浸透也趋向深刻。《金鳌新话》<sup>⑤</sup>、《传奇漫录》、《传奇新谱》<sup>⑥</sup>等一批文言传奇同源殊派，以《剪灯新话》为诱因而各写自己的乱世恋情、人鬼姻缘。越南汉文志怪与

朝鲜李朝的文人笔记,渐成气候,而日本汉文学则处于中古与近世的过渡期。

第四次高潮,是18至20世纪初各国汉文学的全盛期,也是明清文学的咀嚼期。随着汉文学水准的提高,与中国文学思潮呼应的间隔趋短。明代拟古文学与唐宋派、性灵派先后在日韩引起连锁反响,汉文学进一步由宫廷寺院走向街巷。日本江户时代被称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期,汉诗文进一步与经学分离,出现了“海内文章落布衣”的崭新局面。朝鲜李朝后期唐宋派古文与实学派文学各擅其场,越南阮朝几度振兴“洪德文体”亦有成效,“文有超(阮文超,1799—1872)适(高伯适,?—1854),诗有从(从善王,1789—1870)绥(绥理王,1820—1897)”。另一个值得瞩目的现象是,中国白话小说的流传,虽不足动摇诗文在传统汉文学的中心地位,却也涌现出一些以研讨小说为乐的文人群体。日本的中国白话小说仿作与“翻案”(改编为本国历史上的故事),从短篇仿作到长篇,人物情节渐趋复杂,尽管不离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陈套,也以其适合町人武士消闲娱乐的口味而大受青睐。朝鲜李朝与越南的中长篇汉文演义小说,以明朝或本国历史事件为素材,结构渐繁,人物众多,辞章华美。

19至20世纪初,各国汉文学由蜕变而走向衰微,而日本明治时期的汉文学却在攀上最后的高峰后跌入低谷。幕府末年志士以诗明志,语多易水之悲;畅议国事,文系贾晁之风。明治初年,借新闻出版业发达之便,报刊杂志竟载诗文。诗社勃兴,诗人辈出。讽世娱情,唱和不绝。或主宋,或学清,亦有试图以汉诗文以表现西方新观念、新思想者。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文学才黯然退出近代文坛。越南、韩国随着科举的废止、新学的建立以及文字的变革,汉文学彻底失去跻身现代文学的资格,欣赏汉文学成为学者与少数雅士的专利。

包括中国旧文学在内的汉文学的衰微,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有时代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文化根源。我们今天研究亚洲汉文学,正是将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看待的。在亚洲汉字文化圈,作为科举教育内容、统治管理工具及宗教思想载体的汉文学,早已失去了现实的功用,然而作为高雅艺术的汉文学却永远不失其艺术的魅力,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汉文学,对于了解数个世纪该地区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认识价值,至今尚未充分利用。

日本学者中川德之助说:“日本汉文学考其由来,当然是从学习中国文学开始的,时常抱着以中国文学为主流意识,在修辞上也一边考虑着中国文学一边写作。但是,具有漫长历史的日本汉文学的演变,使得作为日本人表达自己思想感情形式的汉文学得以确立下来,形成了日本化的汉文学。”<sup>⑦</sup>韩国、越南汉文学与日本存在诸多差异,然而从总体上说来,上述说法也适合于这两国的汉文学。15世纪徐居正撰写的《东文选序》说:“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混焉而无传世焉?”他们都意在纠正来自不

同方向的排斥汉文学的偏颇。今天中国研究这些国家文学的学者,理当抛弃“你学我的”之类盲目的自傲,切实将其作为邻国的重要文学遗产去诚心接近、虚心研读,惟此也才能发现它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 域外汉文学的模拟性与创造性

作为汉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文学,融入了现今境内外诸多民族的智慧,又对诸多民族文化发展贡献良多。这正像汉字本身发展的历史一样,它无疑吸收了汉民族以外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影响于同一文化圈的历代学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汉字结构、意义与声响的和谐统一,汉语声调韵律的特点,即“电视型文字”与“音乐型语言”的特点,经历代文学家(包括民间文学家)的创造,发展为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这些文学形式,儒道佛合流的思想信仰与中国历史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深厚文化意蕴,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学习才能领会与掌握的,各国作家为此付出了数代人的辛劳。他们不仅要纯熟地掌握作为第二种语言的汉语词汇(及其全部文化意蕴)和其建构规律,不仅要掌握文学批评的细微标准(包括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明言的细枝末节)烂熟于心,而且按照“语言与思维同步出现”的语言原理,做到感触内容与语言表达同步发展,才能进入创作状态。域外许多作家常常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写出与中国作家媲美的作品;不少作品采用了与中国作家唱和或中国作品的拟作、仿作、续作等方式,或者明显表现出模拟某些中国名著的倾向;朝鲜李朝的小说多有假托为明朝故事者,而日本江户时代以赤穗四十七义士事迹为素材撰写的章回体小说又署名为清人鸿濛陈人,以造成中国小说的假象。这些都应该是域外汉文学模仿性的表现。

中国周边民族汉文学能够不断发展,并各自延续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有的是与民族战争与迁移、行政管理与教育制度的持续强化推进等诸多因素相关联的,有的则只是将其作为对汉文化广泛移入的一个方面,以对民族文学发挥补阙、促进与丰富的作用。然而,归根结蒂,还是由于汉文学这种“电视型文字”与“音乐性效果”的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与这些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意识存在契合点,在一定阶段适合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求;而各国文学家的合作曾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外来文学本土化,培育出了民族的汉文学。也就是说,域外汉文学除了模拟性之外,还有创造性。

域外汉文学的创造性体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是阅读方法的多样性。各国根据本国语言特点,对汉文学(包括中国文学)采用了不同的诵读方式。韩国对汉诗纯粹采用音读,用韩语化的读音诵读诗歌,而日本则采用音训结合、颠倒词序的日本化读法,并发明了相应的标识方式。这样,读者不必学说汉语,作者也并非掌握了

汉语听说读写的全面技能之后才能涉足诗坛。日本还根据日语语音的特点,在平安时代便发明了“朗咏”的吟诵形式,用日语吟诵汉诗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sup>⑧</sup> 直接阅读方式的创造,使中国作品不需全部翻译,便能为更多人接受,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教育方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汉文学家。尽管江户时代荻生徂徕等人曾主张废止训读法,采用汉语直读法,但他们的主张实行起来相当困难,所以一直未能广泛推行。

第二是民族语言的汉化。汉文学一诞生,便存在如何与民族生活语言沟通的问题。在展现各国历史文化原貌的过程中,具有民族与地方特色的语言,常被有意识地转化为汉语的表现形式,不仅人名、地名、物名采用汉语格调,有的作家还积极将本民族的俗谚、俚话、谐谭、笑话、琐谈、方言转化为汉语成语、俗语的形式,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与民族特色。朝鲜李朝的实学派文学家朴趾源就是成功的典型。金泽荣只说他“上溯先秦两汉,下包唐宋,融液群言,笃成一家,质朴而光辉,奇变而平实,其旨新,其词洁,其气旺,其味酤,而其音轰如也”,赞语虽多而未言及其语言的创造性所在。朴趾源自己便说过朝鲜汉文和中国文章“字所同而文所独也”(《答苍涯》),说明他具有自觉的创造意识。日本江户时代曲亭马琴创造的“混合和汉、折衷雅俗”的文体,既是吸收了众多中国白话词汇的文体,又将许多日语词汇转化成了汉语形式,对汉诗文与读本两者均有影响。可以说,这些作家用自己成功的作品培养了汉文学的读者。

第三是变体汉文及变种文体的创造。变体汉文即在汉文中加入大量本民族的语法与词汇,这在各国均不乏其例。各国文士还将适合本民族欣赏习惯的文体大为扩衍,不管是根据自己的趣味对原有文体加以发展还是加以改造,都是在汉文学与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结合上做文章。高丽时期的李奎报等人受韩愈《毛颖传》的启示而发展出“假传体”小说的形式,<sup>⑨</sup> 朝鲜李朝文士借传奇小说写梦里乾坤的手法发展出“梦游小说”,借以表现壬辰卫国战争后的民族反省意识,都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变种。江户末期与明治初年流行的“狂诗”、“狂文”,则是中国古诗与古文的变种。它们以玩笑似的态度描写咏唱滑稽、诙谐的内容,不重格律而重谐趣,语言不求古雅而喜俚俗,插入大量日语汉字词汇,与中国诗文的庄重雅洁背道而驰,大异其趣。<sup>⑩</sup> 变体汉文及变种文体的出现,有些产生于文人自娱的需要,有些也具有讽喻现实的内容,都是在“俗”的方面发展汉文学,使其不仅具有政治、道德的严肃内容的样式,而且还有消遣文学、娱乐文学的样式。

第四是翻译注释与改编形式的配合。汉文学规范性极强,借古言今是惯用的手法,这对鉴赏者与写作者造成极大困难。缓解困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韩国的谚解,越南的演音,日本的训读与俗译都是文人学士长期经验的积累,它们往往围绕中国或本国的名著反复进行。朝鲜李朝时期的杜诗谚解,《太平广记》谚解,越南



对《征妇吟》等汉诗作品的演音,以及日本从五山学僧对《毛诗》、《古文真宝》、《文章轨范》、《唐诗选》等的延续不断的注释研究,发挥了极大的普及作用,其本身也应纳入汉文学的范畴。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作者对汉文学的认同态度。即许多作家不仅不是将它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看待,而且不是作为一种官方文学来看待的。前一点许多学者业已指出,而后一点则常被忽略。优秀的汉文学作者往往将汉文学作为个人抒情叙事的必不可缺的精神行为。日本平安时代的菅原道真(845—903)被视为文学之神、教育之祖,至今祭祀他的天满宫、北野神社在日本多达二万余处。他留下的诗文中生动地展现了“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人的悲哀、人的刚强与软弱,四季清爽的变化,岛国的自然美”<sup>①</sup>。一方面是平静的平安宫廷蔓延的妖艳华美,一方面是人性的袒露:失去爱子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无可奈何转徙的官吏生活的忧郁,同僚间嫉妒倾轧带来的烦恼,以及作为教育者指导学生时的兴奋与焦虑,最后在两府贬谪之处聆听底层痛苦呻吟的悲愤,都在他的诗中如泣如诉地倾述出来。这些诗中有诗人的自我形象,深深打动读者的不是身居相位的威严、博士学官的矜持与为官一方的自负,而是一位敏感的诗人日本式的哀愁与郁闷。菅原道真是在用诗与自己交谈。江户末期,诗人藤田东湖在痛感外侮内患交逼,需要“养一国之正气”,上下一心,“尊王攘夷”之时,仿文天祥《正气歌》所作的长诗,历数了日本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慷慨放歌,既是激励同门,亦是自励自奋。汉诗对他来说是抒发正气豪情的最自然的形式,因为不论是哪一种日本诗歌形式都不足以表达这种情感,俳句、连歌、短歌自不用说,曾经在《万叶集》时代兴盛一时而后消失的长歌也不能倾吐得如此淋漓尽致。

在越南、韩国都有一批这样的作品,由于作者写出了独特的生活感受而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继诗文之后兴起的各国汉文小说,在展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朝鲜李朝时期涌现出相当多的供文人茶余饭后消遣的笔记小说,其中不乏针砭时弊的佳作。在当时,寡妇改嫁是绝对不允许的,汉文小说中多有抓住这一问题揭露封建礼教对妇女残酷迫害与摧残的作品,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越南阮屿的《传奇漫录》展现了各种人物的命运,写的最多的是憧憬情爱与幸福的贞烈女子,还有追求公正和精神自由的刚正之士,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下层官吏的酸甜苦辣。《传奇漫录》不仅在通晓汉文的文士中流行,而且在成书不很长的时间便有人作了“解音”即字喃翻译的工作,使与官场无缘的妇人儿童、市井细民也能读懂。它之所以受到粗通文墨的市民及妇女的喜爱,不能不与它在神鬼狐妖、地狱天曹的世界中写出了普通人的小小意愿有密切关系。

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有关中国文学与本国汉文学的研究。汉文学对于以非汉语为母语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与学识相关的文字。自古以来,它被用于行政管